

當代國際政治論叢

China And Europe Toward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走向二十一世紀
的中國與歐洲

宋新寧 張小勁 主編

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

《当代国际政治论丛》编委会

主 编	宋新宁	邓正来
副主编	张小劲	徐泽荣
责任编委	林 苏	周振兵

目 录

- 欧洲联盟的对华新政策…………… [欧盟]魏根深(1)
- 中国与欧洲:面向未来…………… 宋新宁(5)
- 中国与欧洲:从派生性关系向独立关系的发展
…………… [美]戴维·香博(33)
- 欧洲联盟及其对华关系…………… 李庆四(64)
- 冷战后时期中欧关系战略基础初探…………… 戴炳然(98)
- 着眼于二十一世纪的欧中关系及其影响…………… 杨义萍(106)
- 中国与欧洲联盟加强合作的基础与障碍探讨
…………… 佟家栋、郭俊华(121)
- 欧盟推行更积极的对华政策——试析欧盟
新的对华战略文件…………… 王金标、冯仲平(130)
- 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中国与欧洲关系的影响……………
…………… 陈 岳(137)
- 后两极国际体制中的欧洲—中国政治关系
…………… [意]罗伯托·梅诺蒂(144)
- 改革中国的工业结构:对中欧经济关系的意义
…………… [法]塞缪尔·泽韦尔(165)
- 寻求欧洲的亚太政策:意大利在亚太地区的利
益与政策…………… [意]玛尔塔·达 苏(183)

中英合作解决香港问题的展望	
..... [英]迈克尔·叶胡达(204)	
全球背景下中国的环境危机 ... [英]肖恩·布瑞斯林(217)	
欧洲议会委员会制度的比较观察..... 杨光斌(258)	
中欧宪政比较研究案例:市场导向型经济与政 治稳定	[英]罗伯特·班维克(269)
西欧政治发展的轨迹..... 张小劲(290)	
附录:《中国 - 欧洲关系长期政策》文件	(308)

欧洲联盟的对华新政策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欧洲”国际研讨会上的致辞

欧洲联盟委员会驻华代表团团长 魏根深

我本人很高兴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举办的这次国际讨论会，并在此非正式地向诸位谈一谈欧洲联盟新的对华政策、它的起因和时机选择。

直至1994年，欧洲联盟一直没有对中国和对亚洲的政策。我们有的只是单个国家零星的对亚洲和对中国的商业政策，以及成员国之间的协调性贸易政策。1995年初，我们决定该是所有成员国共同努力的时候了。欧洲联盟委员会提出新的关于亚洲的文件，主要是针对东亚的。其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欧盟在文件中试图寻求自身的优势，其首要的是经济优势。但是，该文件并未针对任何单个的亚洲国家，因而委员会自1994年开始拟订对单个国家的战略。三月份我们公布了新的对日政策文件。我十分高兴地告诉诸位，第二份文件是对华政策，它尚未公布，但已经完成，正由各成员国政府讨论。我希望能于十月达成协议，15个成员国届时可以采取一致联合的对华政策。

现在我列举该文件的主要观点，然后很高兴能与诸位讨

论。

该文件的主要观点包括：中国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变革，支持这种变革是符合欧洲利益的。我们所指的变革是中国国内的变化，既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在法制基础上建立市民社会。它们所产生的后果，特别是经济后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国内、东南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有深远影响。如诸位所知，1994年中国是世界第11大贸易国和第10大出口国。我清楚地记得，三边委员会在1979年的东京会议上谈到中国时，中国的份额还十分微小，大约是居世界第40位的贸易国。而今年或明年，中国将成为第10大贸易国，这使得中国可以在世界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中国作为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也是指日可待的。因此，我所指出的第一点就是，欧洲出于自身的利益，应当支持中国出现的变革。在未来的五年、十年或十五年内，中国将发生更多的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革，并对它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地位产生深刻的影响。无需多少想象，中国在十年后毫无疑问地将会与西方七国集团联系起来；也不难想象其他在所有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变化。所以，为了欧洲的利益，要预先行动起来以应付这种变化。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成功？如何实现彼此间联系的加强？我不准备罗列乏味的细节和事实，而想从简单的经济方面入手。我们寻求的是在国际公认的规则下，欧洲商人在亚洲市场运作的条件，这是与中国商人在国外市场所享受的同样或类似的条件。其它问题都源自于此。例如在国际公认的标准方面，欧洲完全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不寻求国民待遇。这个故事，如诸位所知，已经很长了。本周中国的

谈判代表在日内瓦还有另一个目标。我十天前在布鲁塞尔曾同他进行了会谈，我也不能确定本周的谈判能否有所突破。无论如何，欧盟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所有这些再次意味着欧洲对自己利益的考虑。欧洲的公众舆论是不可能一直赞同中国商人在欧洲市场上比我们在中国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优势。

我们将继续增加与中国合作的资金，实际上今年已有所增长，而且还将持续至本纪末，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经济和商业合作，并在很大程度上用于高等教育合作。我们在考察进行法律方面合作的可能性，如培训全国人大的律师和总体上的制度建设。德国政府正在帮助中国建立现代的专利机构；欧盟也在实施一个知识产权法合作项目。当然，政府拨款所能做的毕竟有限，更为重要的是与欧洲商界的合作。比如在上海成立的国际商学院，可以说是合资性质的。上海市政府和欧盟各出资一半，而且欧方相当多的资金来自欧洲商界。五月份我去参加了首期 MBA 课程的开学典礼，学员是 50 位中级经理人员。东方航空公司的一位经理很高兴能以此为起点，开始两年的国际商务培训。学院教师由欧洲人和中国人组成，其课程设置既非完全欧洲式的，也非全部中国式的，而是兼具中国和欧洲特色的，因为必须针对中国市场上的公司与市场之间的特殊关系。以上是我提供的二个实例，说明欧洲对华新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强调人力资源的开发。此外，还有在某些特定领域，如农业方面，特别是中国贫困地区的农业发展问题，双方也要加强合作。

现在我转而谈谈政治方面的问题。欧盟在政治方面的主要目标是使中国全面参与政治安全问题的讨论，包括人权方

面的对话。欧盟对所有其它的伙伴也采取完全同样的方式。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根本不能例外。如果不与中国人谈人权,反而是值得奇怪的了。

此外还有一个时机选择的问题。在7月13日欧盟公布其新的对华政策之后,许多评论认为欧盟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对华政策,特意选择了一条“温和路线”,是在利用中美关系当前所处的“冰冻时期”,或确切地说是“冷淡时期”。这种看法很有趣,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开始着手制订对华政策的时间,远早于李登辉访美和吴宏达进入中国境内等事件。纯粹由于巧合,使我们的政策恰恰在中美关系尴尬之时出台。但这并未使评论者们停止这种类比式的评论。诸位是国际关系方面的学者,因此应该知道,在外交方面,机遇和审慎的思考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

(张 岩译)

中国与欧洲：面向未来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研究中心 宋新宁

一、早期交往的历史

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的“张骞通西域”。张骞本人虽然未能到达欧洲，但是经他两次西域之行而开辟的“丝绸之路”很快就将中国与欧洲联结在了一起。公元166年（东汉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即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里略·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us）派使者自海上来到中国，“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1]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与欧洲国家最早的官方接触。也有人认为，在这个时期实际上并没有来自欧洲的正式使团，而只是一些私人团队，装作自己是外交使节以增进其在中国做生意的机会，而中国朝廷为了自己的威望总是欢迎遥远国度派来的“进贡”使。^[2]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其统治已经越过了帕米尔以西的地区，几乎到达里海。同时，罗马的统治也扩展到波斯亚美尼，而阿拉伯人的崛起也从南方横扫拜占廷。因而出现了罗马人为抵御阿拉伯人而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可能。查士丁尼二世的使团于公元711年抵达长安，以应付其

面临的阿拉伯人造成的危机。^[3]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唐太宗曾于公元638年降旨允许景教派基督教在中国传教。

元朝可谓是中国与欧洲交往的又一次高峰,这当然是蒙古铁骑对欧洲的武力征服。1222年,成吉思汗的第一支军队进入欧洲,很快就在第聂伯河畔击溃了俄罗斯王公们的联盟。此后,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又征服了卡马的保加利亚人和大部分的俄罗斯,在占领了梁赞、基辅、莫斯科后又攻打波兰和匈牙利,一直打到亚得里亚海、地中海、黑海、多瑙河。蒙古大军的铁蹄一方面给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杀戮,同时也使一度中断了的中国与欧洲的联系得以恢复,而且不仅仅是恢复而已。“公元十三和十四世纪欧洲对中国的知识是甚至古代丝绸贸易最繁荣的时期都未曾有过的。这不是由于贸易额超过古代,因为实际上总贸易额反而大幅度下降,而是由于另一种类型关系的发展,即宗教与外交方面的关系。”^[4]1264年忽必烈定都北京后,欧洲人开始再次进入中国,其中尼科罗·波罗和马菲德·波罗受到忽必烈的欢迎,并作为忽必烈的使节返回意大利并带信给教皇,要求教皇选派一百名有学问的传教士来中国。马可·波罗随同他的父亲和叔父于1275年回到中国,觐见了忽必烈。他们三人为元朝宫廷服务了17年之久,并得到了很高的荣誉。马可·波罗也因此能够在中国进行游历,并在返回欧洲后写成了他闻名于世的《马可·波罗行记》,为欧洲人了解中国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自13世纪末14世纪初,教皇开始派遣其传教士来华传教,其中著名的有1292年或1293年抵华的方济各会修士孟德高维诺(Monte Corvino)、1303年抵达中国的科隆的阿诺德

(Arnold of Cologne)以及 14 世纪中叶在中国传教的马黎诺里 (Marignolli)。他们回到欧洲后对中国所作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看法,正如赫德逊所指出的那样:“在十二世纪,欧洲人对地中海地区以外的亚洲和非洲极少有什么知识,大多数地图都把耶路撒冷置于三大洲的中心,地中海则从半路横穿自东而西的大陆块。但是在蒙古的征服之后,亚洲得到了全面的开辟,对它的形状和状况的了解有了高度的准确性;结果是拉丁人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思想态度有了决定性的突破,他们产生一种被禁锢在世界一角的新感觉,是处于人类事务的边缘而不是它的中心。”^[5]当时几乎所有对中国的描述都将它称作是“世上最富裕的地区”,“那个国家人口如此之众多,我们这里的人会认为不可置信”,其城市是“现在存在的,或者也许曾经存在过的,最了不起的城市”,“其中任何一个规模之大都绝非特雷维佐或维琴察所能相提并论”。实际上,哥伦布寻找新大陆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是与他们对中国之向往紧密相联的。哥伦布远航的最初目的地并非美洲,而是中国。^[6]

这个时期中国与欧洲的联系对欧洲产生的另一重大影响是印刷术的传入。1428 年,葡萄牙航海家亨利 (Henry the Navigator) 的兄弟佩德罗亲王 (Prince Pedro) 在访问威尼斯后带回一本《马可·波罗行记》和一张地图,大约 10 年之后,欧洲开始用活字版印刷,很有理由相信这一创造乃是由于报导了远东早已大规模使用了类似的工艺过程而引起的。^[7]

明朝的三宝太监郑和从 1405 - 1433 年奉旨七下西洋,可谓当时中国人的一大壮举。明成祖遣使下西洋与忽必烈海洋远征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力图以和平的方式向海外传播“王

化”和“声教”及所谓“抚外夷以礼，导人以善”，以天朝之德政治普世之天下。^[8]郑和的远航先后到达东南亚、印度半岛、波斯湾、阿拉伯半岛、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在世界航海史上比哥伦布早 87 年，比伽马早 93 年，比麦哲伦早 116 年。郑和虽然并未到达欧洲，但是他的远航对于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仍具有深远影响。郑和下西洋所实现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使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扩展到马六甲地区。苏门答腊、锡兰、亚丁、摩加迪沙、暹罗等都自这个时期开始向中国明王朝纳贡或派出使臣。当 16 世纪初期葡萄牙人阿尔布开克率舰队到达马六甲时，他们遇到了中国的船队，并与之建立了联系甚至军事上的合作。^[9]

1514 年葡萄牙人从马六甲到达中国之后，中国—欧洲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即欧洲列强依靠其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竭尽其侵略、掠夺之能事，使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亚病夫”。葡萄牙人自 1535 年始窃踞了澳门。西班牙人在 1571 年控制了菲律宾，并于 1575 年到达中国。1601 年，荷兰人的舰队首次进入中国，并于 1604 年侵占澎湖，1642 年占领了台湾。英国人威廉·伯恩(William Bourne)在其 1573 年写的《论海上霸权》一书中提出了英国到达中国的五条可能道路，并于 1576 年开始了到中国探险的偿试，直到 1637 年第一支英国舰队到达中国。俄国人是从中国的北方陆路进入中国的，1641 年第一支俄国远征军无功而返后，第二次于 1643 年闯入了中国。

随着西方列强的进入，大批商人和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从 1552—1579 年，先后有 57 名传教士来到中国，此后，又有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利玛窦(Matthieu Ricci)、

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法国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日耳曼人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瑞士人邓玉函(Jean Terrenz)、葡萄牙人阳玛诺(Emmanuel Diaz)、西班牙人庞迪我(Didacus de pantoja)等著名欧洲传教士来华。他们的目的正如利玛窦所说,就是“做耶稣的勇士,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10]欧洲的传教士和旅行家纷纷来到中国,为中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辽阔疆土、众多人口以及不同于西方的儒教、宗法、伦理和习俗所吸引,对中国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和评介,其中不乏溢美之辞,同时也有诸多贬毁,然而却在欧洲掀起了一场持续近百年的“中国热”。从最早的马可·波罗到以后的利玛窦以及步其后尘的欧洲各国耶稣会士,他们不仅向中国的皇帝、宫廷和文人介绍和传播了欧洲的文明,同时也以极大的热情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并向欧洲传递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对中国大加颂扬和褒奖。这些信息引起了欧洲的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军人对中国的极大兴趣。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人对中国给予了高度评价。莱布尼茨认为,欧洲“有必要接受来自中国的传教士”。伏尔泰甚至把中国看作是欧洲国家应该追随的典范。^[11]然而,18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各种先进思想及先进科技的出现,以及因庞贝古城的发掘和由此而产生的希腊罗马文化热,中国逐渐丧失了其在欧洲人心中的吸引力。这里面有欧洲人本身的文化偏见——即以欧洲模式对中国进行评判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与之相对照的中国之落后所致。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不再是世界上最富庶最繁荣的帝国,她的“国土虽然辽阔肥沃,却养不活她的居民”(马若瑟),“中国人掌握并

应用了对社会有益的东西,但在科学方面却远远落后于我们”(伏尔泰),^[12]“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是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她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13]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西方的政治思想家对中国的专制制度给予了越来越激烈的抨击。孟德斯鸠就曾指出:“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她的原则是恐怖。……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害无穷的压力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加凶暴。”^[14]但是,正如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奈指出的:“发现和认识中国,对于18世纪欧洲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正是这种哲学为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15]学者和思想家对中国的看法反映了西方一部分具有理性头脑的人对中国的观念,他们的看法对这些国家政府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政界和商界的利益和需要。正如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对印度政策动机时所指出的那样:“贵族想征服它,财阀想掠夺它,工业资产阶级想以低廉的商品使它屈服。”^[1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对中国予以了极大关注,并对中国之地位和作用作了深刻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曾认为,中国“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17]“中国的革命将要把火星掷进现代工业制度的装满炸药的地雷中,并且引起酝酿已久的总危机的爆发,这种总危机蔓延到国外去,紧接着就要在欧洲大陆发生政治革命。这将是一幅奇妙的景象:中国引起西方世界秩序紊乱;而西方列强们则正用英、法、美各国军舰把‘秩

序’运到上海、南京及各运河口。”^[18]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与欧洲关系的根本性转折。欧洲列强通过一个个对华不平等条约而从政治上屈辱、经济上掠夺中国。这些条约包括：1842年的《南京条约》、1843年的《虎门条约》、1844年的《黄浦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璦琿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76年的《烟台条约》、1881年的《伊犁条约》、1887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1898年的《胶澳租界条约》、《旅大租地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约》、《租租威海卫专条》、1899年的《广州湾租界条约》和1901年的《辛丑和约》，等等。在这个时期，美国和日本也曾通过《望厦条约》、《马关条约》和《辛丑和约》参与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瓜分和掠夺，但就最早发动侵华战争、强迫中国签订屈辱性不平等条约等等而言，欧洲列强给中国所造成的伤害可以说是最大的。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民国时期，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也充满了曲折的历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作为参战国之一虽然没有直接出兵，但仍对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作为战胜国却没有能够分享胜利的成果，反而成为列强分赃的对象之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虽然是日本在1915年就提出来的，然而却有1917年的英、法、俄、意、美与日本的密约为其扫障，而且是在英、法和美国的支持下才得以在巴黎和会上通过并列入《凡尔赛和约》的。1926年，当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又是英国人第一个跳出来出兵进行干涉。1931年9月18日，日本借口“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

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对此采取了“不干涉主义”的态度,而英、法则实际上采取了纵容的态度,旨在与日本就各自在华利益达成协议。英国政府甚至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辩护。以英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李顿为团长,包括法、德、意、美代表参加的李顿调查团关于中国东北问题报告书的意见和建议虽然惹恼了日本,然而这并非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而是要反对日本的独占,主张将东北从中国割裂出去,以便欧美列强共同指染。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中国与欧洲关系出现了戏剧性变化。中国与英国成为在亚洲共同对日直接作战的盟友,双方在缅甸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合作。与此同时,英美两国于1942年10月共同宣布取消其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3年,中美、中英正式废除旧约、签订了新约。不久,荷兰、比利时、挪威等国也先后宣布放弃其在华特权并另订新约。当然,轴心国方面(日本、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维希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在同年先后与汪伪政权签订了放弃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的协议。当然我们也看到,英国在战时与中国的合作过程中始终是不情愿的,常常抱怨美国过分看重了中国的作用,在军事合作的初期还人为地制造了种种障碍,在废旧约签新约的问题上也是不断地拖延,并且在九龙租界地问题上顽固不让步。大战结束后,欧洲国家自顾不暇,中国实际上成了美国独家的势力范围,而英国仍在最后时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即在1949年4月发生的四艘英国军舰与待命渡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激烈炮战的事件。

二、冷战中的中国与欧洲

有些学者将冷战时期的中国-欧洲关系视为“派生性”的关系，即认为直到1992年以前，中国与欧洲的关系都是从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派生出来的。^[19]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冷战时期，中国曾先后面临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和围堵，中国对外关系是受到其与美苏关系制约的。但是就中国与欧洲关系，特别是与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之间关系而言，与其说中国对欧洲关系受中国与美苏关系的制约，毋宁说欧洲国家的对华关系受到其与美苏关系的更大制约。因为就中国和欧洲而言，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性要比欧洲国家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自主性要强得多、大得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中国政府就依据“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项方针开展新中国对外关系。在1949—1951年，先后与11个（8个欧洲、3个亚洲）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国家、4个亚洲民族独立国家、5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瑞典、瑞士、丹麦、芬兰、列支敦士登）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挪威和荷兰是较早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中国开始建交谈判的欧洲国家，但是双方之所以直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才建交（与挪威大使级，与英国、荷兰代办级），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中国，而在于这些欧洲国家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导致双方在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等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就如丘吉尔向艾森豪威尔所表示的那样，“英国当然更愿意把美国而不是红色中国作为自己的盟